



总第2辑
2007年第1辑

主 编 李佑新

毛泽东研究

MAO ZE-DONG RESEARCHES

湘潭大学出版社

主 编 李佑新

毛泽东研究

MAO ZE-DONG RESEARCHES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湘潭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泽东研究. 2007 年. 第 1 辑/ 李佑新主编. -湘潭:
湘潭大学出版社, 2007. 8

ISBN 978-7-81128-004-3

I. 毛… II. 李… III. 毛泽东思想-理论研究-文集
IV. A8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38345 号

毛泽东研究

2007 年第 1 辑 总第 2 辑

主编 李佑新

责任编辑: 黄显中

设计: 胡 瑶

出版发行: 湘潭大学出版社

社 址: 湖南省湘潭市 湘潭大学出版大楼

电话(传真): 0732-8298966 邮编: 411105

网 址: <http://web.xtu.edu.cn:8080/pub/>

印 刷: 湖南新华印刷集团邵阳有限公司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346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500

书 号: ISBN 978-7-81128-004-3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严禁转载、翻印)

主 办

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

顾 问（按姓氏笔画排序）

方克立 石仲泉 李 捷
杨瑞森 沙健孙 沧 南

编委会

主 任 彭国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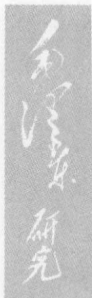
副主任 罗宏书 李佑新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乐夫 王向清 许全兴 李建国
范贤超 唐正芒 唐凯麟 唐洲雁
夏佑新 郭建宁 梁 柱 熊华源
颜佳华 薛广洲

主 编 李佑新

副主编 王向清 颜佳华 唐正芒



目 录

本刊特稿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探索的当代价值·····	李 捷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文化背景·····	许全兴(10)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趋势·····	沧 南 韩莹莹(21)
现代性问题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趋势·····	李佑新(29)
“智慧”说与学术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王向清(39)
从实践哲学的双重含义看毛泽东哲学的性质·····	晏意华(49)
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历史总结·····	荆世群(54)

毛泽东政治思想研究

毛泽东邓小平关于行政体制改革原则与途径的思想·····	陆小成 彭国甫(61)
毛泽东邓小平政府权力观与当代中国政府权力运行机制创新·····	颜佳华(72)
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群众路线的时代内容·····	刘景钊(81)
刘少奇对毛泽东建党思想的理论贡献·····	周锦涛 周 斌(87)
党的政治路线正确与否决定着党的自身建设的命运·····	傅锁根(103)
毛泽东邓小平关于行政发展目标的思想·····	潘信林(113)

毛泽东社会发展理论研究

- 建国初期毛泽东的和谐社会思想.....熊 辉(118)
- 对毛泽东国家利益观评价的若干思考.....张俊国(129)
- 毛泽东农村建设思想及其对当代新农村建设的启示...周批改 陈建兰 陈 谦(139)
-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公平思想.....吴华云(151)
- 建国初期毛泽东关于“五个统筹”思想的历史考察.....王孔容 徐 娅(159)
- 论毛泽东“保护生产力”命题的时代蕴意.....周甄武(164)

毛泽东军事学说研究

- 毛泽东军事心理思想及其运用.....廖小平(172)
- 略论陈赓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贡献.....唐正芒 彭秋香(182)
- 粟裕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贡献.....李衍增(190)

毛泽东生平研究

- 史华慈比较文化视野下的卢梭、孟子与毛泽东.....萧延中(195)
- 毛泽东:一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何云峰(220)
- 毛泽东与少年中国学会.....李永春 肖志伟(247)
- 论毛泽东的教子之道.....夏佑新 杜 兵(259)

书评、动态、综述

- 毛泽东的思维结构及其内在张力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读后感.....王文兵(272)
-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趋势探讨.....袁辉初 袁艳玲(279)
- 2006 年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综述.....陈 龙(287)
- 近两年来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综述.....彭辉艳 李 勇(295)
- 征稿启事.....(301)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探索的当代价值

李 捷

摘 要: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可以归结为发展和民主两大问题。毛泽东对如何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进行了曲折的初步探索,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血的教训。这种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提供了借鉴经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主要包括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等三大方面。对此,毛泽东同样进行了长期而又曲折的探索。对坚持党的领导的探索留给我们的是宝贵的政治遗产;对人民当家作主方面的探索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严重的失误;而在依法治国方面留给我们的则主要是教训。毛泽东的探索,为我们党在新时期提出的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关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方针提供了启示。

关键词:毛泽东 对社会主义的探索 发展问题 民主问题

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历史问题的继续,又有新的变化。

我们现在的探索,是历史探索的继续,又包含了新的内涵和时代特征。

对我们来说,研究现实和回顾历史,都是有益的。同样,从现在遇到的问题来反观当年的历史,同样是有益的。

我们当前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概括起来说,无非是两大问题:发展问题和民主问题。一个发展问题,一个民主问题,这应当说是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两个关键问题。而民主问题过不了关,发展问题也不可能长久。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在这两大问题之中,现实又是怎样同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一 关于发展问题

科学发展观是关于发展问题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完整地说,就是:以人为

这是作者 2006 年 9 月 7 日在湘潭大学韶风名家论坛上的讲演,发表时作了修改和补充。

* 作者简介:李捷(1955-),男,山东平阴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毛泽东生平思想研究。

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里的关键在于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为什么要提出科学发展观呢?就是因为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些成就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新的发展阶段,关键是要做到科学发展,不仅要看经济发展速度,看经济总量的增长,还要看能源消耗,看环境状况,看社会是否和谐和公平公正,看城乡是否良性互动。不这样做,就不可能持续地、长久地、健康地发展,就有可能由发展导致一系列深刻的社会矛盾。

酝酿提出科学发展观,在理论上有一个逐步发展和深化的过程,在实践上也有一个逐步发展和深化的过程。不到一定的火候,不具备一定的条件,是不可能提出这个思想的。

回顾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 28 年的历史过程,大致经历了一个从主要依靠政策拉动到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再从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到需要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拉动转变的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现实形态的历史发展过程。与之相对应,从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到提出“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再到提出科学发展观,这是一个观念形态的历史发展过程。

如果再往前回溯,这两个过程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可以说都是从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的。有的是正面继承了毛泽东时代的思想遗产,有些是吸取了毛泽东时代的深刻教训。

(一)新中国成立以后到 1956 年召开中共八大以前,先是恢复国民经济,然后是一边搞工业化、一边搞社会主义改造。先是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然后是走自己的道路。

这个时期,在发展问题上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就是走自己的道路,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固定的模式,由此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是最大的思想遗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探索就是从这里发端起步的。

(二)1956 年起,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在走自己的道路方面,首先遇到的是走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是损害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利益换取工业和城市的快速发展呢,还是走农轻重按比例协调发展的道路?通过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制定中共八大路线,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从理论上和政策上初步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个时候,关于发展问题最有价值的有哪些东西呢?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点。一是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农业是基础,要发展工业,就必须重视发展农业。二是沿海和内地

的关系,要注意发展内地工业,平衡地搞好工业布局。三是统筹兼顾的政策。四是提出了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需要说明的是,当年讲“统筹兼顾”和现在讲“统筹兼顾”,在含义上有很大的不同。当时是从解决六亿人口的吃饭穿衣问题出发的,现在是从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出发的。

(三)有了理论,有了政策,不等于不会犯错误。错误从哪里开始的呢?从发动“大跃进”开始。在“大跃进”中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一是超越阶段的错误,误以为可以早日建成社会主义,以为可以先于苏联直接进入共产主义;二是违背经济规律的错误,最主要的就是破坏了综合平衡。

当年有没有过反思呢?有的。通过初步总结“大跃进”的教训,一是认识到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不发达阶段,还需要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公有制经济,还需要货币,还需要等价交换,还需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并且承认这是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二是认识到不能没有综合平衡,特别是农轻重的平衡,同时还认识到农业内部也有平衡问题,工业内部也有平衡问题,不只是一个粮食、一个钢铁这样简单。这两个问题上认识的进步,就是那个时候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

(四)有了反思,就一定没有反复了吗?不尽然。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开始,就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出现了反复。“反右倾”的结果,导致了更大的破坏。一是严重地破坏了农村生产力,导致了粮食生产的大倒退;二是严重地破坏了工业生产力,导致了工业生产的大紧缩。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两千万人从城市返回农村。这是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的最终结果。受损害的不仅是农民,还有城里人。这就叫六亿人民共度经济难关。

大反复带来了大反思。这一次比前一次更深刻,更彻底。一是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关系的大调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在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规模和管理体制都退到了相当于过去的初级社的水平,这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搞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下了基础。二是国民经济计划体制的大调整,重新明确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基本理顺了投资规模与国家财政能力、建设能力的关系,基本理顺了积累与城乡消费的比例关系,理顺了农轻重之间以及各部类内部的比例关系。可以说,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在这个时候才固定下来,这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三是明确了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和步骤,目标就是“四个现代化”,步骤是分两步走。后来提出的“全面现代化”以及“三步走”战略,就是从这里演变发展而来的。

(五)按理说,只要照这个思路发展下去,没有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尽管我们提不出改革的任务,但是发展的速度并不会慢。不幸的是,毛泽东这时的思路发生了根

本性的转变,从经济建设转变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上来,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济建设还在继续,而且还有发展,还有成就,但总的来说,既偏离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没有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更大的成就,也没有达到反修防修的既定目的,而成为被极少数野心家、阴谋家利用的一场动乱。这是一个严重的全局性失误。对毛泽东来说,也是一个事与愿违的悲剧。

但是,通过“文化大革命”,从反面告诉我们两个最为重要的结论:一是要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为那些一时的突发事件所动摇、所左右;二是要坚定不移地搞社会主义改革,把那些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加以变革,使改革成为推动现代化建设、推动思想观念转变、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我们不可能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根本问题上那样思想统一、坚定不移;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我们也不可能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这个根本问题上那样思想统一、坚定不移。这个思想遗产,当然不是毛泽东直接给我们的,但是毛泽东的失误在这里面是相当重要的因素。它促使我们进行深刻的反思,而带领全党实现这个具有革命性、根本性的深刻反思,是邓小平的功劳。从此,我们走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才有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才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提出。

总的来看,我们现在的这些指导发展的原则,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坚持改革开放,从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到坚持科学发展观,都是从毛泽东当年的探索中逐步发展而来的。今天的发展,基础离不开毛泽东;今天的发展,得益于毛泽东;今天的发展,又超越了毛泽东。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这就是思想发展的辩证法。

二 关于民主问题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关系我们国家长治久安的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常讲一句话,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句话,既是对现实问题的解答,也是对历史的总结。

下面,我们分开来说,看一看这句话包含的三个方面,是怎样得来的。

(一)先看第一个,坚持党的领导。理解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问题的核心,就是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问题。我们说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有根本的不同。不同点在哪里?首先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不可动摇。我们过去常讲一句话,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是党政分

开。有人以为我们是要把党和国家分开,其实这是误解。我们讲的党政分开,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

当然,各国的民主政治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我们国家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决不把自己的特点强加于人,但是也不能允许别人把他的东西强加于我们。各国民主政治的特点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历史来的,从民主政治的发展演变历程来的。

在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是以多党竞选和三权分立为基本特征的民主制度。这是历史演变而来的,不是人为的设计,人为的设计是设计不出来的。仔细考察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不难发现,就是在这些国家里,这种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也是千差万别,各有各的特点。这些特点,都是在这些国家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美国有美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史,英国、法国、德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史也各不相同。这些规则,都是通过历史演变而来,都有其历史根据。

我们国家则不同。中国共产党不是通过竞选上来的。在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执政的时期,当时的政治制度不允许中国共产党有合法竞选的地位。不要说共产党没有这种地位,就连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民主党派也没有这样的地位。怎么办?所以毛泽东讲,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中国共产党只能走武装革命的道路,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以牺牲了数千万英烈的代价,其中包括毛泽东的四位家人,终于取得了天下,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才有中国共产党在国家中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这个地位,是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全中国各族人民所公认的,并且写入了《共同纲领》和《宪法》之中。

因此,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决定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期执政的只有中国共产党一家,只有它在国家中具有领导地位。这是毛泽东时代留给我们的最大的政治遗产,即党在国家中的核心领导地位。因此,在我国宪法的序言里,郑重地记载了这段历史:“一九四九年,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武装斗争和其他形式的斗争以后,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12]16}

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历史地位是不可撼动的。撼动了这一点,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亡党亡国,还不要说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连民族独立都谈不上,中国很可能四分五裂,要说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就是核心利益。

另外,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证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

发展中国。在中国,谁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在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苏联解体的情况下使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之路?只有中国共产党。因此,只要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现代化,就不能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因此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体的。如果谁要说,我爱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我不爱中国共产党,那只能是骗人的谎话。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分割的。这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最大的政治遗产,也是从邓小平以来历届党中央所一脉相承、始终坚持的根本点。动摇了这一点,将会国无宁日。

(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还有一个如何更好地实现党对国家的领导的问题。这就说到了第二个问题,依法治国。

在如何实现党对国家的领导的问题上,我们党自毛泽东时代起,经过了许多探索和尝试。

建国之初,我们党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上,有过很好的设计。那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制度。这些制度,既是历史的延续,又是社会主义原则的体现,至今,仍然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石。

除此之外,我们还进行了一个探索,那就是党和国家的权力如何合理配置的问题。应该说,开始的探索,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个问题,而是沿用了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的办法。那就是党政合一。1956年中共八大以后,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毛泽东建议做出两项重要调整。第一,是党中央分为一线、二线,毛泽东处于二线,放手让刘少奇、周总理和邓小平等在一线主持党政日常工作;第二,是中央设立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下处理党政日常工作。这一中央领导体制,中间虽有一些变化,总体来说,基本上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以前。

“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遭到严重破坏。随后,在党的九大以后逐步建立起来的是所谓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下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弊端充分暴露出来。再加上实际上存在的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占了上风,党内民主遭到破坏,使我们在如何实现党对国家的领导问题上的探索走到了歧路上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重新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同时,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重新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从这时起,就提出了对党和国家领导体制进行改革的重大问题。

我们当时的思路,是按照党政分开来进行的。但这产生了一种误解,以为在中国现有的体制下,党和国家的权力是可以分开的。实践的结果是,把党和国家的权力分

开,实际上行不通,而且有很大的危险性,搞不好就把党的领导架空了。也就是说,党政分开不等于要把党和国家的权力分开。

党政合一不行,党和国家的权力分开也不行,问题又回到了原点上:怎样才能实现党和国家的权力的合理配置?这实际上又回到了“文化大革命”在这个问题上的最大教训是什么这个问题上。第二个历史决议讲得很清楚:“党的各级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12]844} 也就是说,要在国家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解决好党和国家权力的合理配置问题。按照现在的提法,就是要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实现依法治国。这就是党如何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问题。

要解决好党和国家权力的合理配置,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什么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13]27} 还指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13]26}

具体来说,有几个关系:(一)党和人大的关系:支持人大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经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并对他们进行监督;(二)党和同级政府的关系:支持政府履行法定职能,依法行政,党委在同级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集中精力抓好大事,支持各方独立负责、步调一致地开展工作;(三)党和政协的关系:支持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职能。

总的原则是: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这样,从党政合一到党政分开,再到依法治国、依法治政,这些都是深刻总结“文化大革命”教训,又坚持原先探索中正确的东西的必然发展结果。

(三)坚持党的领导,除了要处理好党和国家的关系、做到依法治国以外,还要处理好党同群众的关系。这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问题。

在人民民主问题上,毛泽东一直在探索有效的途径。早在延安时期,他就对黄炎培先生说过,中国共产党可以不重蹈历史覆辙,可以避免“历史周期律”,那就是靠人民民主,让人民起来监督自己的政府,使政府不致政息人亡。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自领导了“三反”运动,严厉惩处了贪污腐败分子。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又开始探索通过共产党开门整风的办法,来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个好办法。而这正是他在探索人民民主的过程中,从正确的命题出发而导致错误的结果的开始。实践证明,“四大”既脱离了社会主义民主,也脱离了社会主义法制,不是一个成功的探索。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特别是在“四清”运动以后,毛泽东感觉用了许多办法自上而下地解决党内的阴暗面,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于是,他想探索用自下而上的办法,通过“四大”的方式,用群众运动来解决党内的“反修防修”问题。这就有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

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群众运动被推向了极端。毛泽东没有预料到,原先得心应手的群众运动,一旦脱离了党的各级领导,竟会发展到失控的地步;更没有料到,党内少数野心家和社会上的打砸抢分子会沆瀣一气,利用群众运动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中国共产党历来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而“文化大革命”滥用“民主”、滥用“群众运动”,恰恰走向了自身的反面,导致了民主集中制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严重破坏,甚至是践踏民主与法治的恶果。这一刻骨铭心的教训从反面证明:人民民主和群众运动不能脱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能脱离社会主义法治的轨道。由此,我们逐渐走上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正确轨道。这其中,“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3]24}。

如今,我们探索的任务是否已经完成,探索的过程是否已经结束了呢?远远还没有。在我们的面前,还有不少尚未破解的实际问题有待进一步探索解决。

当前一个突出问题,是执法公正的问题。现实中大量事实证明,行政机关在具体执法中,如果违背了人民的意愿,脱离了群众的可以接受的程度,就有激化人民内部矛盾、把自己置于人民群众的对立面的危险。因此,依法治国一定要以人民为本,一定要支持和维护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一定要关注和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这是在社会主义法制中贯穿的同其他社会类型的法制根本不同的价值取向。

当前另一个突出问题,是党内腐败的问题。现实中大量事实证明,如何在党的强有力的领导下把法治的力量同人民群众的力量结合起来,通过制度建设和强化监督

来防止和铲除党内腐败,这不失为一条需要继续探索的道路。

总之,我们已经找到了正确的道路。我们为此付出过沉重的代价。我们还要继续探索。

以上,我们分两个方面来探讨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探索的当代价值。我们的结论是:毛泽东的探索为我们奠定了制度的基石,打下了发展的基础,提供了成功的借鉴。我们不能因为今天的进步,而去怀疑前人的智慧;我们更需要从前人的失误中找到走出失误的道路,使我们比前人做得更加聪明些。但千万不要骄傲,骄傲只会使我们比前人做得更糟。总之,我们要学习毛泽东,不忘毛泽东,继承毛泽东,又要超越毛泽东。

历史是理解现实的一把钥匙,现实又是体验历史的一扇窗户。在现实面前,我们需要做的是,多想想前人的智慧;在历史面前,我们切记不要做的是,少对前人指指点点。因为,总有一天,我们也会被现实所超过,化作历史的尘埃。

参考文献:

- [1]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2]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 [3]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文化背景

许全兴

摘要:一般研究者主要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的视角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而忽视了它的文化运动背景。这种理论上偏颇,导致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内涵理解上偏颇,即只注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的实际相结合,忽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本文提供若干鲜为人知的史料,说明在毛泽东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前,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的文化人在总结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基础上,已从不同视角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中国化的问题,论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应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者和发展者的问题。毛泽东对“中国化”的阐述既吸取了当时理论工作者的观点,又大大高出他们的思想,具有经典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涵是继承和发扬中国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中国传统文化 毛泽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是时下我国理论界研究的热点之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已列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二级学科。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论文、著作大量涌现。但笔者以为,时下许多论著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内涵的理解上存在着明显的偏颇:只注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的实际相结合,忽视或很少讲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这种理解上的偏颇又直接影响到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忽视对中国历史、哲学、文化的学习和研究,忽视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这种理解上的偏颇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没有能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背景。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既是中国革命实际运动的必然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必然,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必然。长期以来,一般研究者主要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的视角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而忽视了它的文化运动的背景。本文拟提供若干鲜为人知的史料,以有助于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

本文是在《全国“毛泽东与20世纪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 作者简介:许全兴(1941-),男,江苏无锡人,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共中央党校哲学研究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哲学、毛泽东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文化背景和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概念、命题都是历史的产物,是认识成果的结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同样如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之时就开始了,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则有一个过程。它不可能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初就能提出,而只能在传入之后、在实际的结合过程中取得重大成果之时才能形成。

早在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中国的先进分子就零星地介绍过马克思主义,但总的说来,当时的中国还缺乏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基础和思想文化条件,他们的介绍只能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前史。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李大钊率先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传播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早期传播的重点是唯物史观。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虽然革命处于低潮,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却出现了高潮,重点是唯物论辩证法。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综合了苏联三十年代哲学的新成果,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被毛泽东称为中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艾思奇、陈唯实、沈志远、胡绳、冯定等一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的分子不畏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开展了一个哲学的大众化、通俗化的运动,其中以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影响为最大。这一哲学的大众化、通俗化的运动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唯物辩证法成为时代哲学的主潮,给反动派造成了极大恐慌。陈立夫在《唯生论》的导言中说:“这几年来唯物论的论调,日见其嚣张”,中国人,尤其是未熟的青年学生,深受其影响。为了对抗“日见嚣张”的唯物论,于是作为国民党要员的陈立夫不得不假借他人之手炮制《唯生论》^[16]。反对辩证唯物论的代表人物张东荪也惊呼:“赞成唯物辩证法的书籍,现在大有满坑满谷之势。”^[21]在哲学的大众化、通俗化的运动中,陈唯实写作出版了《通俗辩证法讲话》(1936年4月)、《通俗唯物论讲话》(1936年9月)、《新哲学体系讲话》(1937年2月)、《新哲学世界现》(1937年3月)等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有重要贡献。他在《通俗辩证法讲话》第一讲第二节“辩证法并不难懂”中曾说:讲辩证法的书,“最要紧的是熟能生巧,能把它具体化,实用化,多引例子或问题来证明它。同时语言要中国化,通俗化,使听者明白才有意义”^[37]。他对“中国化”没有进行特别的说明。很显然,陈唯实此处所讲的“具体化,实用化”和“语言要中国化”,仍然是属于通俗化的范畴,而不是后来毛泽东、艾思奇等所提出的“中国化”。当时的学术界对他提出的“语言要中国化”也无反响。现在,许多研